

疫情风险认知过程与代际互动模式研究

吕鹏, 刘芳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中国进入“风险社会”, 风险呈现突发性与常态化。2019年12月暴发新冠疫情反映了全社会风险认知的滞后性与差异性。在民众风险认知差异化情况下, 如何通过个体互动, 达成风险认知与行为共识的过程机制。通过访谈研究发现, 在家庭层面, 个体风险认知与行为差异主要存在于代与代之间。在疫情暴发阶段, 亲代的迟顿回避和子代的警觉与敏感形成对比; 扩散阶段, 子代开始对亲代的风险认知进行强化, 亲代尝试认知与评估风险; 均衡阶段, 两代人就风险认知基本达成共识, 但仍有部分亲代选择排斥。在风险认知与共识达成过程中, 呈现三种代际互动模式: 其中, 传统的自上而下、互联网时代自下而上属于单向代际互动模式, 容易造成代际对峙与冲突; 基于主体性的双向互动模式, 充分尊重两代人的主体地位, 有效地弥合了代际冲突; 主体性的双向互动模式以信任关系优化风险传播方式、以信息解码提高风险传播效能、以强弱互补增信政府权威信息。微观家庭层面代际互动模式的探究, 为宏观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层面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疫情; 公共卫生事件; 风险认知; 代际互动; 主体性; 协商式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0)03-0011-13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公共突发事件频发, 例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1]。公共突发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危害性, 给人民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2019年12月武汉暴发新冠疫情; 2020年春节期间, 全国人民普遍响应号召, 居家隔离、佩戴口罩。同时也存在“90后劝父母戴口罩”“子女举报父母打麻将”“益阳女大学生劝父母戴口罩被骂”等新闻事件与热议话题。网友评价“心大的老年人、胆小的年轻人”。在无特效药物与治疗方案的情况下, 戴口罩是目前阻隔病毒传播的有效办法。但在疫情中, 两代人的风险认知、行动选择出现了差异, 是否戴口罩, 就是典型的差异化表现。据公开报道, 45岁以上为易感

染人群, 即80、90后的父母成为疫情高发人群。但这并未引起父辈们重视, 他们依旧不戴口罩, 参加打牌、聚餐等聚集活动, 将子代嘱咐看成“小题大作”。为强化父辈的风险感知, 年轻人绞尽脑汁进行规劝, 成了“最操心”的人和“管家”, 微博上更是出现了“如何劝父母戴口罩在线等”的热门讨论。面对疫情, 子代与亲代对风险感知的差异化表现, 引发了笔者的兴趣。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至今, 中国长达16年未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空白期, 使民众和干部都存在风险认知滞后性和异质性问题。本研究重点关注父代与子代在风险认知有差异的情况下, 通过个体互动达成风险认知与行为共识的过程。

(一) 社会风险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存在的风险类型也不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阶段, 将风险分为前工业社会风险、工业社会风险、风险社会风险三类^[2]。前工业社会的风险, 以自然灾害为主; 工

收稿日期: 2020-03-01; 修回日期: 2020-0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反社会行为预测研究”(17ZDA1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8VXK0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大数据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预测研究”(71673159); 湖南省社科基金智库委托项目“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社会公共政策优化研究”(17ZWA21); 中南大学创新驱动计划“基于能量视角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过程大数据预测研究”(2018CX038)

作者简介: 吕鹏, 江苏徐州人,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安全、大数据社会治理, 联系邮箱: lvpengceps@vip.qq.com; 刘芳, 湖南怀化人,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公共安全

业社会的风险,以安全事故、意外伤害为主;风险社会的风险是现代性的产物,以金融风险、核泄漏、生物变异等科学技术风险为主。现代社会,由于民众的阶层不同,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对风险认知也存在差异。风险包括两层含义:①风险分配。贝克认为,如同财富分配一样,风险也会分配。风险的分配与阶级相关。财富集中在上层阶级,而风险集中在下层阶级。财富、权力、地位可以使人们获得风险免除的“特权”。富人可以选择居住地来规避风险,穷人只能待在原地,疫情中出现了多起明星出国避难新闻。贫困与风险叠加,导致弱势群体受影响更大,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此外,接受过良好教育者可通过获取信息规避风险,王甫勤认为,文化程度越高、媒介接触越频繁、阶层地位越高的个体对风险的认知也越强^[3]。②风险转移。贝克认为,不同阶级的风险认知和对风险的处理与补偿能力不同。事实上,风险是可以动态转移的。叶锦涛等人认为一部分群体可以利用资源优势(财富、声望、知识等)转嫁或降低风险,成为低风险阶层;由于资源匮乏,弱势群体受冲击最大,成为高风险阶层^[4]。疫情中,相关部门也多次呼吁要多关照“生活困难的群众”。由此可见,风险存在分层与马太效应。

(二) 风险认知与代际差异

基于社会风险的分层,社会各群体对风险的认知有差异。风险认知是指人们对风险的主观评价与判断并由此做出决策倾向,包括对风险的感知、理解、记忆、评价、反应等^[5]。个体因素是影响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6],包括性别、年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等^[7]。曼海姆也指出,个体因出生年代、成长背景不同,其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会表现出差异性。疫情期间,个体差异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代际差异,即青年一代与父辈一代。两代人对新冠疫情的风险感知和反应存在极大差异。相对于90后,60后的父辈们整体文化水平低,媒介利用素养不高,不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电子媒介等互动方式^[8]。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是代际差异最突出的表现^[9],数字鸿沟体现为技术接入鸿沟、技能使用鸿沟、知识获取鸿沟等^[10]。媒体报道与风险信息同样影响风险认知^[11]。高山等人认为,公众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快速获取风险信息并感知风险^[12]。在疫情初始阶段,青年人由于自身优势(信息资源的获取能力强)对风险认知能力也相应强,而父辈们在风险认知中处于劣势。有研究表明,个体风险认知越强,越会采取措施来降低风险^[13]。这是造成了风险认知的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口罩文明”之战是典型的表现。青年与父辈因为风

险认知的差异,产生代际冲突。

刘利群等人认为,风险认知受“关系”影响,风险信息通过“关系”过滤,送至认知主体。“关系”附着情感、信任与资源,能促进人与人之间及时、高频、有效的互动^[14]。信息来源于强联结个体(家庭成员、街坊邻里),比弱联结个体(合作伙伴)更容易影响个体态度与行为^[15]。这在理论上说明,代际风险认知差异可以通过互动调整。随着疫情防控的持续推进,两代人甚至全社会的风险认知终将趋同。

(三) 代际互动与风险应对

疫情期间,代际如何通过互动消除风险认知差异及其造成的冲突,事关家庭微观层面的防控大局。代际互动涉及教化与交流模式,在传统社会,一般是长辈教化晚辈^[16]。米德提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三种文化^[17]。在现代社会,“后喻文化”具有很大解释力,周晓虹也提出类似的“文化反哺”即反向社会化^[18]。这是年轻人向长辈传递知识、价值观念的过程^[19]。吕鹤颖认为,父辈会利用人生经验指导子代,子代成长于技术革命和互联网时代,前喻式文化传递已经不能满足子代的成长需要^[20]。同时,子代可以借助熟悉互联网信息的优势,反哺长辈。但不论是前辈向晚辈学习,还是晚辈向长辈学习,都是单向模式,无法真正化解并弥合代际冲突。李新华提出了“第四种文化”(互喻文化)^[20],指出代际相互学习是一种双向模式。互喻文化起源于米德理论,但又与米德理论有所不同。晚辈向长辈学习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长辈向晚辈学习则是受时代的驱使,晚辈的优势在于掌握并熟悉技术知识。李新华明确了双向互动模式的重要性,但没有指明在双向互动中,父辈与子代应保持平等的对话姿态。双向互动改变了代与代之间的知识传递模式,但要真正实现有效的沟通,还应在双方对话的基础上坚持“主体际”原则^[21]。确保民主、平等的对话机制。疫情期间,亲代与子代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存在差异。具体到每个家庭,采取何种互动模式,将会对风险认知的增益与均衡化进程产生不同影响。

基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四个具体问题:第一,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父辈与子代的风险认知存在什么样的差异?第二,年轻人采用何种沟通方式来强化中老年人对疫情的风险认知?第三,父辈与子代如何实现整体风险认知的提升与趋同化?第四,父辈与子代通过何种互动来实现代际弥合,增强家庭凝聚力,促进疫情防控?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从2020年1月20号到2月9号,笔者分别对27位80、90后青年人进行结构化访谈。具体了解在风险来临时,他们和父辈们各自对待风险的态度,就疫情风险进行沟通,以及子代劝说长辈采取措施的过程。探究风险感知与风险应对的代际差异、风险认知趋同中的代际互动机制、代际互动模式的疫情防控效能等问题。本访谈对于年龄界定,采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规定,即14~35岁。选取第六代(80、90后)青年^[22],选取这一群体主要是因为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共同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互联网普及、中国加入WTO、扩大对外开放、高等学校扩招、教育大众化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代人相同的社会经历,使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呈现趋同性^[23]。“代”在这里有两个方面涵义,一是生物学意义的“代”,比如家庭中的亲代与子代;二是曼海姆提出的“代”(作为社会变迁的推动力量)^[24]。曼海姆以历史时段与历史事件为依据,将社会群体划分代际^[25]。80~90后的父母多为60~70后,他们是两代人,在价值观、行为方式、态度习惯等方面呈现代际分化。而隶属同代的群体,形成“代共同体”意识^[26]。样本选取既考虑同质性(同一代青年),也考虑异质性(特征不同),尽量保证获取访谈内容的客观性。具体信息见附表1。选取27位青年访谈,综合考虑相关因素,以确保其代表性:第一,文化程度具有阶梯性,教育程度从中专、本科,到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在读青年;第二,职业呈现多元化,有学生、公务员、医生、高校教师、高校辅导员等,也有私企员工、服装店员工、创业者等,还有全职太太等无业人员;第三,年龄上呈现层次性,包含了从85后至90后的不同年龄段;第四,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广泛性,不限于湖南省,还有来自江苏、广东、河北、河南、四川、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和地区的样本。由于疫情原因,访谈采取微信语音、电话访谈等非接触方式,个别以面对面访谈进行,每次访谈时间在30~60分钟不等。

三、风险发生的动态过程与代际风险认知差异的逻辑

疫情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分为暴发阶段、扩散阶段、均衡阶段。不同阶段,面对同样的风险,代

表1 青年基本情况描述

编号	性别	出生年	学历	职业	户籍/常住地
F01	女	1998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永州
M02	男	1989	高中	培训机构老板	江苏苏州
F03	女	1990	研究生	高校宣传干事	湖南郴州
F04	女	1990	研究生	博士在读	湖南怀化
M05	男	1987	本科	私企员工	广东深圳
F06	女	1989	研究生	国企员工	湖南邵阳
M07	男	1991	大专	快递公司员工	湖南长沙
F08	女	1993	中专	服装店员工	湖南长沙
F09	女	1990	研究生	公务员	河南三门峡
F10	女	1988	研究生	医生	河北承德
F11	女	1998	大专	社工	湖南益阳
M12	男	1989	本科	私企员工	湖南怀化
F13	女	1990	研究生	私企员工	湖南岳阳
F14	女	1995	研究生	博士在读	四川达州
M15	男	1996	大专	创业者	贵州铜仁
M16	男	1992	研究生	博士在读	山东济宁
F17	女	1988	研究生	高校教务干事	广西南宁
F18	女	1991	研究生	高校教师	广东广州
F19	女	1990	本科生	全职太太	湖南怀化
M20	男	1990	研究生	高校讲师	湖南浏阳
M21	男	1999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耒阳
M22	男	1998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怀化
F23	女	1997	研究生	硕士在读	湖南娄底
M24	男	1995	研究生	硕士在读	湖南邵阳
F25	女	1999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永州
F26	女	1998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衡阳
M27	男	1986	本科	高校辅导员	湖南长沙

际对疫情的态度先是存在差异,后是趋同。总体来看,在暴发阶段,亲代偏“迟钝”、子代偏“敏感”;扩散阶段,子代风险认知强化并积极影响父辈,之前“迟钝”的亲代也尝试理解并正识风险;在均衡阶段,亲代与子代对疫情基本达成共识,风险认知总体趋同。当然,仍有少数“顽固者”对疫情风险“置若罔闻”。

(一) 暴发阶段: 亲代偏迟钝与子代偏敏感

由于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以及对疫情的客观危害程度的认识不同,个体间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异。有的人能快速识别风险并做出反应,有的要经历较长的认知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疫情期间做的社会心态调查显示:民众关注新冠肺炎时间较早,但

重视其时间比较晚^[27]。在风险发生的初始阶段,由于信息获取渠道与内容不同,导致人们对风险的主观判断和对真实风险的认识存在差距^[28]。风险认知影响个体的行为反应^[29],风险认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应对;风险认知越低,越倾向于采取回避行为^[30]。部分亲代与子代在反应态度上存在同质性,主要表现为对信息的积极关注。访谈发现,家庭经济地位、父母职业、社会资本、获得信息渠道等都会导致两代人在风险暴发阶段对风险认知的差异。例如:

我们爸妈平时生活在城市里,所以还是比较了解实时信息,我跟他们说戴就戴了,毕竟是为他们好啊。(访谈对象 F08)

我爸妈是公务员,单位里面今年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所以不用我劝他们戴口罩,他们还会反过来要我晚辈别出门,今年都没去拜年,在家待着。(访谈对象 F06)

我们家我和老公都是医生,我们跟父母说戴口罩,他们肯定会戴的。(访谈对象 F10)

如果亲代能与子代保持认知同步,就会减少代际冲突,有利于疫情防控。但在被调研 27 个对象中,子代与亲代对疫情认知不同步的现象也显著存在。总体上,亲代偏迟钝,子代偏敏感。

1. 亲代风险认知的迟钝

由于“有限理性”,面对不确定、损害性突发事件,公众由于知识、信息、能力、经验有限,往往会做出非理性选择^[31]。80、90 后的父母大多是 70 前出生,获取疫情的信息有限,对疫情知识的掌握总体上少于子女。即使同处在互联网时代,两代人在获取、运用信息方面仍然存在差异,父母多是后知后觉。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指出,网络世界的掌握权是颠覆两代人之间传统地位的催化剂^[32]。既有的知识和生活经历对风险认知具有影响^[33],使其对风险产生更高的控制感,进而降低风险认知^[34]。此外,风险认知还受后果严重性、影响的灾难性、恐惧的普遍性等因素的影响^[35]。国家卫健委通告,普通人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应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的风险^[36]。但是,亲代习惯性地用老套路、旧思维看待新问题,成为疫情风险认知的“迟钝”与滞后者,具体表现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是无知无畏型。

我爸妈平时不看新闻,一般看电视剧,微信里面主要看个人或者群里发的信息,不怎么关注新闻,即使看到群里有相关信息也认为是骗人的。(访谈对象 M21)

第二是侥幸心理型。

我看到新闻后就给我爸妈买了口罩,当时花了 90 块钱买,幸好下手快,后面都买不到口罩。一开始我爸妈不想戴,觉得戴着不舒服,也担心别人看笑话,认为没那么严重,后面媒体有关疫情的报道越来越多,我跟我爸妈说要延迟上班和上学他们也就觉得事情严重了,都戴口罩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抱怨戴着不舒服。(访谈对象 F26)

第三是认为小题大做型。

1 月 20 号我跟我爸一起上街采购过年物资,心想街上流动人口多,就劝他戴口罩,我爸认为别人都不戴,自己也没必要戴,自己身体好不怕。为此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我爸认为疫情没有到自己家乡,不可能感染,大家都是小题大做。(访谈对象 M05)

第四是听天由命型。

我父母也不怎么在意,都觉得自己是经历过非典、地震的人了,生死看淡了,该来的总会来的。(访谈对象 F14)

2. 子代风险认知的敏感

作为“数字社会的原住民”,第六代青年人(80、90 后)对疫情期间的风险普遍更为敏感。2018 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02 亿,以青少年、青年、中年为主,10~39 岁群体占 70.8%,20~29 岁年龄段网民占比最高,达 27.9%^[37]。第六代青年人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及时获取信息,了解疫情扩散情况、死亡人数、传染信息、防控措施等。青年人实时跟踪疫情信息,对疫情紧张敏感,保持极致的自律,并全面武装自己,表现出比亲代更敏感的风险认知。

我每天早上醒来和晚上睡觉前都会看一遍今天的疫情进展,然后赶紧果断转发至家庭群中,怕家里人不知道,不重视。(访谈对象 F11)

我每天发新闻、视频还有网络上各种关于肺炎的段子在群里,我给他们买了口罩,不让他们随便出去,我从回家到现在快半个月了还没有出过一次门。(访谈对象 F13)

我从回家开始就没有出过门,虽然也觉得待久了难受,但是我肯定不会出门,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一定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待在家里是最安全的,也是为社会做贡献。我如果必须出门肯定会戴口罩,不戴口罩不仅让自己置于危险中,也会间接成为病毒的传播机器,太可怕了,听说眼睛也可以传播,我想买护目镜但是没买到。(访谈对象 M27)

(二) 扩散阶段: 风险理解与逐步强化

在此阶段,父辈中的一部分开始了解疫情,并逐渐感知到疫情风险。在家庭的代际互动过程中,听得

进去子女的知识传播与行为劝导,并逐渐采取应对措施。

1. 亲代开始风险感知与评估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迟钝者”中最先了解疫情的亲代,尝试理解疫情风险。由于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亲代的风险认知有一个过程,导致其在“相信还是不相信子代?”“采取还是不采取行动”之间徘徊。这是一个行为决策动态博弈的过程。期间,部分亲代会通过微信群、电视新闻、官方媒体等主要渠道去了解疫情的客观风险并对其进行再次评估,考量风险的危害程度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从而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与行为。例如:

我现在每天都给我爸妈打电话,给他们发微信,我老妈应该还是比较相信了,因为我们那边都封路了。(访谈对象 F04)

大年初三开始戴口罩,初一我爸爸还去打牌了,一开始还觉得不要大惊小怪,27号去了外婆家,我和哥哥姐姐,都在说这个事情,而且新闻也有报道,他们有点被说动了。(访谈对象 F23)

2. 子代努力强化亲代的风险认知

在风险暴发阶段已经对疫情的相关信息有一定了解的子代个体,随着疫情的扩散,基于自身掌握的互联网技术优势和信息获取能力等,对疫情风险的认知继续得以深化。除了强化自己的风险应对能力,更主要的是对“冥顽不灵”的亲代进行疫情风险传播的“反向教化”,具体措施有如下几种。

第一,子代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买到口罩、相关的医药物品等,提供给父母和家庭成员使用。使用疫情防控物品(口罩、消毒剂、药品)的过程,本身就是传播风险知识的实践过程。

第二,青年人对亲代的教化是全方位、彻底的,动用各种风险知识的可能传播方式。例如对微信群疫情知识宣传频度提高,宣传内容更具多元化、直观化,从简单的文字信息到图文并茂的视频,从单一的宣传策略转向为多样化的劝导。

第三,甚至还要通过卖萌、吓唬、撒娇、举报、哄骗等“绝招”,想方设法地试图说服亲代提高疫情风险认知度。例如:

我爸爸天天出去打麻将,跟他说了也不听我的,他其实知道疫情严重,就是行动跟不上,我爸爸明天如果还去打麻将,我跟他说明我就去举报他。(访谈对象 F14);

但是我公公婆婆不是这样的,他们平时都在农村生活,一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都不是很在意,后面天

天发微信信息、各种视频、报告感染人数,我还叫我老公一起做思想工作。(访谈对象 F17)

(三) 均衡阶段: 总体趋同与少数排斥

此阶段,铺天盖地的官方媒体信息与社区防疫行动,加上子女在家庭互动中的发力,父辈们逐步、全面认识到疫情风险,代与代之间就风险普遍达成共识。

1. 风险认知逐渐趋同

疫情风险全面蔓延阶段,各种新闻媒介开始宣传,国家层面进行全方位应对。全国进入高度戒备,从中央到基层,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患者到医务工作者,都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电视、新闻、媒体连续报道,社区摸排、楼栋排查、电梯消毒等防控行为纷纷使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到此阶段,亲代与子代在风险认知、疫情防控等方面达成共识,对疫情风险认同度基本一致。父母都认为疫情风险非常严重:是事实,不再是“谣言”了。甚至,部分家庭出现了反转,原本子代怎么劝说都不听劝的亲代,反过来交代子代不要外出、不要参加聚会、要勤洗手、戴口罩等,实现了风险认知的均衡化。互联网上还出现年轻网友分享去看望老人被拒之门外的案例。

初一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那时候武汉封城的消息出来了,加上全国各地都在报道,我们又跟父母讲这个疫情的严重性,感觉他们有点重视了,我们当时出去买东西,都是戴着口罩的。后面到了初四、初五的时候,我老爸老妈就更重视了,还专门打电话叫我们别出门。(访谈对象 M27)

1月26号开始戴口罩,之前疫情报道还没有那么严重就没戴,后来网络报道越来越多,武汉封城,疫情数据持续上升,我也给他们普及了知识,叮嘱他们多看新闻,家里的微信群大家一直都在发信息,父母就引起了警惕,家里人都觉得确实要注意,现在大家对疫情的认知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访谈对象 F25)。

2. 极少数“顽固”分子对疫情风险顽固排斥

疫情越来越严重,民众普遍对风险有了深刻认识与高度警惕。但是,仍有极少数“顽固”分子处于“放松”状态。外出访友、参加娱乐活动、不戴口罩等行为仍然个别地出现。27个访谈对象,最终都与亲代达成了风险认知共识。但网络报道中,仍不乏相关妨碍行为,多是老年人。例如,牡丹江市七河村^[38]、江西上饶市广信区^[39]等多地出现聚众赌博被罚事件。国家明令疫情期间禁止人员聚集,但部分居民仍不在意危险,即使接受了子代的疫情知识“反哺”,仍我行我素,排斥对风险的认识,于是,有的年轻人就选择了举报行为。例如在1月29日,四川省全县一名女孩举报父亲聚众打牌,该行为受到广大网友点赞^[40]。这种

“大义灭亲”的行为,并非出于忤逆长辈,完全是出于安全与健康的考量。

四、风险认知过程中的代际互动模式

在疫情中,围绕风险认知和规避风险行为的强化,代际互动呈现三种模式。

(一) 自上而下模式: 训诫与教化

在传统关系中,子代话语权由长辈赋予,呈现正向社会化。“正向的社会化是上一代人用既存的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知识、劳动技能等哺育下一代,使其成为长辈所希望的、适应社会环境的、担负特定角色的合格成员”^[41]。因为职业、经验、经历等影响,亲代风险认知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子代。但是,亲代始终不会放弃“谆谆教诲”,在婚姻、工作、生育等方面,试图以人生体验来训导子代,疫情期间,自上而下的代际互动模式始终有其存在的烙印。

1. 传统家长式权威训导: “听我的没错”

国外遵循“人人平等”,费孝通认为“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总是有尊卑之分的,年龄是尊卑的标准”^[42]。梁漱溟也曾感叹西方“拿主意”和“听话”的是同一人,中国不同,二者是全然分开的^[43]。疫情面前,两代人迥然不同的态度,背后离不开传统家长式权威作祟。作为长辈,往往训诫晚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试图规范子代行为,以维持自身的权威^[44]。家长总是认为自己最懂,小孩子说的怎能算数。疫情面前,亲代习惯性地以家长权威“驯化”年轻人,即使知道存在风险也有可能对子女的劝导不放在心上,反而教导子女“不要乱来”。疫情蔓延阶段,家长的风险认知度提升之后,出现反转式的“正向教导”(劝子女别出门、戴口罩),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家长式权威的表现。

“但我爸还是没当回事,我今天又跟他吵架了,他硬要出去打牌,觉得在家里没意思,之前劝他戴口罩戴了一天就没戴了,我爸比较固执,他就喜欢别人听他的,我说的不太放心上,感觉是要剥夺了他的权威一样。(访谈对象 F11)

这几天爸妈看了很多新闻,加上我们这边政府也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爸妈现在比较重视,不再提拜年的事情了,甚至还叮嘱我不要出门,多穿点,不要感冒了,现在生病去医院很麻烦。(访谈对象 F26)

2. 固化思维与惯性依赖: “不要小题大做”

社会变迁过程中,亲代适应新生事物能力更弱,造成两代人在面对同一风险时出现差异化的表现。年

龄较大者的生活态度、行为习惯基本定型,对新事物的关注度随之降低。研究表明,大多数70年代前出生的人喜欢按经验处理事务,与年轻人向往新事物形成对比^[45]。疫情暴发后,亲代往往坚持其一贯的思维方式,不自觉地以传统经验来判断,采取自认为可行的方式应对。甚至劝导子代不要紧张、“不要小题大做”。

在我们家,我和弟弟还有我老婆都会跟父母讲疫情的事情,一开始我老爸不太在意,觉得我们都是小题大作,他自己还到处打牌呢。(访谈对象 M02)

我表姐他爸妈就觉得是戴口罩是小题大做,他们觉得政府会处理的,疾病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没必要那么担心,我表姐也是90后,她94年的,她觉得疫情很严重,经常发朋友圈,很在意这个事情,为这个事情还和他爸爸吵架,我那天去他们家,正好碰到她和她爸爸两个人吵架,他爸就跟她说“不要神经兮兮的,没那么夸张”。(访谈对象 M21)。

(二) 自下而上模式: 优势与反哺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在知识、技能方面有优势,他们是职场生力军,经济的独立,削弱了以父辈为核心的绝对的支配权^[46]。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呈现“去中心化”特点^[47]。不囿于正式、传统的沟通与教化模式,而是平等模式。亲代常感叹“做不了年轻人的主”^[48]。青年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关于疫情的即时知识与信息,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普遍深刻。获得了反向“教育”的机会,实现了疫情的风险反哺,呈现代际互动的“自下而上”模式。

1. 行走的播放器: 风险防控的“知识反哺”

传统社会崇尚经验(多是旧的),现代社会推崇科学知识(多是新的)。知识可转化为资本和权力,青年人凭借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与学习优势,进入权力中心^[49]。疫情发生时,子代通过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权威渠道获取知识,确立了对长辈的话语权,颠覆了传统的单向权威^[50]。尤其新媒体具有去中心化的功能,亲代的传统权威受到挑战^[51]。在疫情早期,信息通过互联网传播,年长者多消息不灵通,后知后觉,尤其偏远农村地区的一些60后基本不看新闻、不用智能手机,消息闭塞,只通过有限渠道了解外部情况,即使同样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数字化应用,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有限。子代可以迅速获取有关疫情的即时信息(死亡人数、感染人数、捐赠物资、在线购买口罩等),亲代则要请教子女或者自己花更长时间摸索。有学者总结,亲代是信息化时代的“侏儒”,子代是“巨人”^[52]。在数字世界里两代人被硬生生分割成两

类人, 父母一代在信息获取、加工、运用、再生产方面都赶不上年轻人, 知识结构化偏弱、思维习惯固化, 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互动方式。因此, 两代人对疫情的风险认知与应对能力存在代际差异具有必然性。疫情期间, 子代对亲代进行了一系列“知识反哺”, 不断向父母普及疫情风险知识。

一开始爸妈觉得没那么严重, 非典都没怎么样, 这个也不会有多大危险。看到大家都没出去, 网络报道也很详细, 每天就叮嘱他们看新闻, 将感染数据发给他们看, 渐渐地他们觉得疫情确实不乐观, 都在家待着, 平时基本上没出门。(访谈对象 F03)

一开始不严重, 父母也觉得没啥, 后面买口罩买不到就觉得严重了。父母会看报道, 就会吸收知识, 不让出门还是会听, 我还打算做个 ppt、视频给他们看。(访谈对象 F18)

2. 建立行为共识: 风险防控的“技能反哺”

年轻一代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能力更强。疫情中, 新生代(80、90 后)对中生代(60、70 后)进行了生活技能和数字技能的反哺。

第一在生活技能方面, 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体现在很多方面, 尤其是对“新器物”使用。年长者在疫情早期对风险的认知不够, 要么抗拒戴口罩、要么不知道佩戴方法。年轻人通过互联网了解信息, 在口罩购买类型、佩戴方式等方面获取专家建议。

我妈一开始也不戴口罩, 后面天天跟她说就戴了, 但是她戴的口罩不是 N95, 是以前用来防风的口罩。而且一个口罩反复用, 我不提醒她, 她就打算一个用到底。(访谈对象 F04)

我平时跟父母关系很好, 这些年很多事情他们都会听我的建议, 所以戴口罩的意见也很容易被采纳。但是他们戴口罩的知识还是有问题的, 我妈特别节约, 最开始一次性口罩反复戴。(访谈对象 F19)

第二是数字技能。中生代接触互联网基本是成年后与参加工作阶段, 新生代则是伴随互联网共同成长。对后者, 互联网不仅是工具, 更是生活本身^[53]。在疫情阶段, 子代积极对亲代进行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反哺, 教他们搜索疫情信息、下载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搜狐、新浪、网易)等, 并不断转发信息与视频, 希望亲代能够更充分了解疫情相关知识。

我妈对疫情没有我爸爸关注度高, 我爸爸看新闻多, 所以对疫情知识比较了解, 我过年就教我妈妈下载微博, 腾讯新闻, 让她可以看看新闻。(访谈对象 F09)

3. 淡化“人情往来”: 风险防控的“价值观反哺”

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是“复制型”传承, 年长者对于传统价值观具有较强的认同。现代社会则具有“代际更替性”与“代际差异性”, 是“创制型”传承, 表现为子代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与变异^[54]。中国社会是一个讲“关系、人情、面子”社会^[55], 是礼俗社会, 讲人情世故会获得好评; 不与亲友往来, 处境将会孤立、凄凉。对 70 年前出生的人来说, 春节是走亲访友的最佳时机, 亲戚之间的人情往来是人之常情。子代不走亲戚, 是不懂人情世故。疫情期间, 许多长辈宁愿冒着被传染风险, 也要走亲戚。

我爸初三还去亲戚喝喜酒了, 我叔爷爷的孙子结婚办酒, 我和姐姐没去, 我爸爸、妈妈、弟弟都去了, 劝也劝不住, 他们没戴口罩, 因为觉得都是自己家亲戚。(访谈对象 F01)

亲代遵循传统社会标准, 子代则遵循个人标准。疫情期间, 传统的“人情往来”是否应该让位于疫情防控, 成为争论的焦点, 再次体现代际差异。毫无疑问, 应暂时搁置“走亲访友、人情往来”等传统习俗。青年人在此期间发挥了表率作用: 首先, 自己在疫情期间严格遵守防控要求, 坚决居家隔离、减少串门, 选择微信拜年或网络远程拜年等方式。其次, 青年人积极配合政府宣传与劝导, 劝阻父母和长辈, 不要坚持老观念, 引导其使用网络拜年替代传统的走亲访友, 最后, 主动拒绝亲朋好友上门拜访, 减少大家的风险。

但是我叔伯要来拜年, 我是不希望他们来的, 这个非常时期, 不能只顾人情来往, 还是要从实际出发。(访谈对象 M15)

青年人的价值观不同, 第六代青年人价值观愈加多元化, 已经实现后物质主义转变^[56]。亲代较少主动尝试新事物, 固守传统, 而子代更相信自己的选择, 不唯权威论^[57]。只要能够降低风险, 就应该去做, 不会固守老传统。这体现了价值观背后的反哺机制。

我都要被我爸气死了, 这么严重的疫情, 国家都发文少串门了, 但是他们还觉得今年没走亲戚, 面子上不好看, 我就问他们是命重要还是人情重要, 后面劝说了也就没去了, 感觉现在父母成为“小孩”我们成为“大人”了, 什么都要叮嘱下。(访谈对象 F04)

青年人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反哺, 在疫情防控中的发挥了巨大作用, 也成为互联网时代构建亲密、平等的代际互动关系的有益尝试。

(三) 代际双向互动模式: 交互主体性生成

疫情风险中的代际互动, 并非纯粹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 更多的是一种双向互动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 都是单向的、不平等的。在双向互动

过程中,地位日趋平等,两代人互为主客体,教化者与被教化者角色实现了切换,具有交互主体性。

1. “主体-客体”的固有困境

代际互动的主体与客体模式,容易导致单一化的教化模式,引发家庭关系紧张。亲代对子代、子代对亲代的单向教化,都会出现“唯我论”。自我为主体、将他人看作客体,导致个人主义倾向,要求客体遵从主体的需求与意愿,造成关系恶化甚至对抗^[58]。疫情中,纯粹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单向互动,都会造成代际冲突。第一,正向社会化虽然符合传统,但对于拥有“知识话语权”的青年人来说,权威性不足。疫情发生时,亲代凭借经验来认知风险并教导子代不要小题大做,这种以自我为主体、忽视客观性的教化,引发青年人的质疑与反抗。尤其在家长权威主导的家庭,一场“硝烟战”随时暴发。长辈的“绝对权威”并非为解决代际冲突的良策,青年人对风险有自己的评估与判断。第二,子代强势的反向社会化也会引起亲代的批评和抵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子代在文化与知识方面的优势,使得家庭话语权发生部分位移^[59]。虽然子代已经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如果子代以知识权威自居,将自我作为主体,不仅不能让亲代接受反向教化,反而会让亲代滋生被“毛头小子骑在头上”的不服气感,造成代际冲突。代际互动不应是纯粹的正向社会化或者反向社会化。在疫情中,一种新的双向代际互动模式得到了实践。

2. “主体-主体”的新模式实践

真正的主体性应相互需要,互为目的与手段,以交互主体性为补充^[60]。只有尊重对方的主体性,自己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疫情风险中,子代与亲代二者应互为主体。在人类传统文明中,教化者与被教化者角色长期不变,这种代际互动模式与生物繁衍世代重合。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的代际互动模式受现代文明冲击,如果还是按部就班、遵循传统理念,无疑会深化代际矛盾。现代社会的教育模式已不再仅仅维护“主体-客体”模式的权威,还形塑了一种代际互动的新模式。代际关系中的相互主体性,具有弥合代际冲突作用。尽管代与代之间存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取向等差异,但并非不可逾越,无论沟深沟浅,最底层部分总是相连的,毕竟有浓得化不开的血缘关系^[61],双方都存在妥协和让渡权力的空间。有研究发现,子代会为维持与亲代的互助和亲密关系而让渡权力^[62];父母为了维系情感也会主动放弃权力争夺^[63-64]。中国社会的家庭极具韧性^[65]。可见,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感情纽带,连接着代际群体,表面的断

裂制造了弥合的契机^[66]。基于代与代之间强有力的血缘与情感纽带,新模式不能因循守旧而沿用“专制-服从”模式,而要构建“协商式亲密关系”。疫情期间,一种新的主体互动关系即协商式关系,正在被实践。

截至今天(2月1号),当地的封路举措,网络新闻的报道,揭示着疫情也越来越严重,爸妈倒是紧张起来了,开始注重防护,也会叮嘱我少出门,一开始是我说服他们,现在他们也会将微信圈看到的疫情信息转发给我,有时候爸妈还会跟我在一起讨论湖北疫情的情况。(访谈对象M07)

五、代际互动新模式的疫情风险防控效能

新模式不仅具有化解冲突、弥合家庭代沟的意义,对疫情防控大局也具有重大意义。它涉及全局风险防控的微观实践层面,强化了末端执行力度。在疫情防控中,这种“主体-主体”代际互动新模式的实践效能体现在三方面。

(一) 以信任关系优化风险传播方式

在危机与风险中,代际的信息传播,具有信任的优势,能及时消化、吸收和传播内容,倍增疫情防控公共信息传播效能。

第一,加速了民众对官方信息的消化与理解。我国危机信息的传播以政府为主导^[67]。政府拥有全文信息,但容易出现“官本位”式传播,缺乏公众意识^[68]。子代最了解亲代的需求,可代为接收、加工、转达疫情的重要信息。加深了亲代对信息的有效理解,能及时化解恐慌情绪、提高风险防控意识。

第二,加深了对互联网信息的理解与使用。互联网媒介的信息传播具有广泛性、及时性等优点,是联结政府、公众、个体的有效桥梁。但长期以来,中老年人对互联网普遍持否认态度,实际上,这是片面的刻板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掌握其使用技能。事实上很多互联网App应用信息都是准确、及时、有用的,疫情期间,青年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将情感纽带作为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桥梁”。亲代通过代际互动获知的信息,必然具有高信任度^[69]。于是,年轻人将互联网信息发布在微信群等,让亲代及时准确、深入了解疫情风险。在此过程中,老一辈的互联网信息获取能力获得了很大提升,对互联网的认识也更加理性、全面、深刻。

(二) 以信息解码提高风险传播效能

疫情期间,信息的对称性、公开性、透明性至关

重要, 涉及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生命健康。由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地位利益等存在差异, 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存在不对称现象。在信息化社会, 作为“数字移民”的老年人^[70]对智能手机与互联网使用能力不强。在疫情期间, 老人极有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取风险信息; 青年人网络操作熟练, 获取信息能力强, 将很多涉及疫情的知识与词汇进行信息解码, 并及时将疫情信息、预警知识、防控政策等利用方言、顺口溜、形象动画、自编歌曲等多种形式重新编码, 使其形象化、具体化, 成为老年人容易理解的信息形式。青年人的信息解码与二次传播, 有效缓解了代际间信息获得的不对称, 避免老人成为“信息孤岛”。降低了亲代因为信息接收不及时、风险认知不充分导致的感染概率, 对抗疫工作贡献大。

(三) 以强弱互补增信政府权威信息

随着新媒体技术应用, 信息发布者、信息接收者与传播媒介三者间的关系发生变化^[71]。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将信息快速发布到网络上, 受众通过微信、微博等接收并转发信息, 形成二次传播, 缩小了信息传播周期^[72]。子代与亲代均可将获取的信息发至微信群或者面对面交流, 进行二次传播。家人、亲戚、朋友等亲密对象的态度与行为容易对个体形成“同伴压力”, 使个体的主观信念与判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73]。本次疫情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亲代了解的相关信息多来自微信。可以说, 通过弱关系获得信息, 也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青年一代获取信息途经多为网络“弱关系”(微博、新闻客户端), 长辈获取信息多为亲密朋友等“强关系”^[74]。代际互动新模式, 有效结合了弱关系、强关系来源的疫情信息, 畅通了传播渠道、增加了风险认知、强化了风险应对。通过向家庭成员及时传达政府部署、防控政策、专家解读、疫情风险知识等, 促使其积极参与互联网讨论, 这不仅增强了公众对政府部门与权威专家的信任, 而且也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有效沟通。

六、结语

疫情期间, 国家迅速出台了有力的防控政策和措施, 并发动全社会进行积极应对。在微观个体与家庭层面, 其风险认知、家庭互动、行为决策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如果宏观抗疫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有“网眼”疏松, 必将导致抗疫效果大打折扣。因此, 家庭层面的微观互动与积极作为对整

个国家的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由于代际风险认知不同, 造成两代人不同的风险判断与行为模式。疫情暴发初期, 年轻人率先戴口罩, 长辈并不信; 随着疫情扩散, 长辈才开始戴口罩, 年轻人使用各种办法科普知识、通报疫情、传授技能、做长辈工作。当代青年人不是“垮掉的一代”, 而是家庭健康的守护者、“口罩文明”践行者, 乃至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疫情期间, 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升长辈的风险认知, 并督促其采取正确的防控措施。在疫情中的代际互动过程, 家庭成员通过多种代际互动模式达成对疫情的共识, 一种“代际协商”新模式也被实践出来^[75]。本次调研的青年群体, 不管其背景(职业、年龄、地域、教育程度等)如何, 最终都在国家疫情防控的总体布局下, 与亲代达成风险共识。代与代之间合力完成了对疫情风险的防控。这种新的代际互动模式, 优化了信息传播方式, 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压力, 强化了风险沟通效果。这种模式为类似社会风险事件微观层面的应对提供了样板。当然, 本次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鉴于疫情影响, 调研采用了电话、微信等非接触方式进行, 无法体验现实情境面对面地与访谈者达成情感共鸣; 调研样本数有限且时间较紧迫, 无法获知所有青年人与中年人、老人的代际互动情况, 只获取了子代的访谈资料, 亲代的信息是从子代处间接获得。如果能够获得相关信息, 将进一步促进此领域研究, 这些将在未来予以加强。

参考文献:

- [1] 钟开斌. 突发事件概念的来源与演变——基于对《人民日报》、党的中央全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2, 13(5): 26-35.
ZHONG Kaib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emergenc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ople's daily, the report of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J].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2, 13(5): 26-35.
- [2]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文,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BECK U. Risk society[M]. Trans. HE Bowe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
- [3] 王甫勤. 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1(2): 83-91.
WANG Puqin. A research on risk society and the residents' risk percep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J].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0, 11(2): 83-91.
- [4] 叶锦涛, 萧子扬. 谁在害怕? ——大都市民众风险感知的现状研究[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9(6): 127-136.

- YE Jintao, XIAO Ziyang. Who is afraid? ——Research on the status quo of risk perception of metropolitan citizen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29(6): 127-136.
- [5] SITKIN S B, WEINGART L R. Determinants of risky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A tes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risk perceptions and propens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6): 1573-1592.
- [6] SLOVIC P, FISCHHOFF B, LICHTENSTEIN S. Rating the Risks[J].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81, 21(3): 14-39.
- [7] FLYNN J, SLOVIC P, MERTZ C K. Gender, race,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J]. Risk analysis, 1994, 14(6): 1101-1108.
- [8] 洪杰文, 李欣. 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10): 50-74.
HONG Jiewen, LI Xin. The “Cultural feedback” of we chat in rural families: A case study of chen qu village[J].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019, 41(10): 50-74.
- [9] 王斌. 数字化代际冲突: 概念、特征及成因[J]. 当代青年研究, 2019(1): 116-122.
WANG Bin. Digital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J]. Contemporary Youth Research, 2019(1): 116-122.
- [10] 韦路, 张明新. 第三道数字鸿沟: 互联网上的知识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4): 43-53.
WEI Lu, ZHANG Mingxin. The third digital divide: The knowledge gap on the internet[J].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006(4): 43-53.
- [11] 王治莹, 梁敬, 刘小弟. 突发事件情境中公众的风险感知研究综述[J]. 情报杂志, 2018, 37(10): 165-170.
WANG Zhiying, LIANG Jing, LIU Xiaodi. A review of risk perception of the public in emergencie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8, 37(10): 165-170.
- [12] 高山, 李维民, 凌双. 社会资本对风险的社会放大的阻抑作用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5(1): 147-153.
GAO Shan, LI Weimin, LING Shuang. Research on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 25(1): 147-153.
- [13] 范春梅, 贾建民, 李华强. 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公众风险感知及应对行为研究——以问题奶粉事件为例[J]. 管理评论, 2012, 24(1): 163-168.
FAN Chunmei, JIA Jianmin, LI Huaqiang. Research on public's perception of risk and coping behavior in food incidents[J]. Management Review, 2012, 24(1): 163-168.
- [14] 刘丽群, 刘又嘉. “关系”视角下的风险认知重构——基于认知过程的考量[J]. 编辑之友, 2019(6): 57-62.
LIU Liqun, LIU Youjia. Reconstruction of risk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nxi”: Based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es[J]. Editorial Friend, 2019(6): 57-62.
- [15]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I[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78(6): 347-367.
- [16] 宫秀丽, 刘长城. 青少年期社会化双向模式的发展特征[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8(4): 27-31.
- GONG Xiuli, LIU Changcheng.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wo-way socialization pattern in adolescence[J]. Issues on Juvenile Crimes and Delinquency, 2008(4): 27-31.
- [17] 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 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 周晓虹, 周怡, 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7.
MEAD M.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n generation gap[M]. Trans. ZHOU Xiaohong, ZHOU Yi. Shijiazhu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7.
- [18] 陈云松, 朱灿然, 张亮亮. 代内“文化反授”: 概念、理论和大数据实证[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1): 78-100.
CHEN Yunsong, ZHU Canran, ZHANG Liangliang. Reverse cultural transmission within generation: Concepts, theories and big-data evidence[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7, 32(1): 78-100.
- [19] 周晓虹. 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 青年研究, 1988(11): 22-26.
ZHOU Xiaohong.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culture[J]. Youth Studies, 1988(11): 22-26.
- [20] 吕鹤颖. “80后”青年问题与代沟弥合[J]. 学术研究, 2019(8): 164-169.
LU Haying. The problem of “post-80s” youth and bridging the generation gap[J]. Academic Research, 2019(8): 164-169.
- [21] 李新华. 青年与成年: 未来社会的二元结构——兼论“第四种文化”(关于“代际”理论的手记之三)[J]. 当代青年研究, 1989(3): 12-18.
LI Xinhua. Youth and adulthood: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future society—Also on the “fourth culture”(the third of note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heory)[J]. Contemporary Youth Research, 1989(3): 12-18.
- [22] 袁贵礼. 中国青年的世代与第六代青年的诞生[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1): 5-9.
YUAN Guili.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youth and the birth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youth[J]. China Youth Study, 2015(1): 5-9.
- [23] 陈玉明, 崔勋. 代际差异理论与代际价值观差异的研究评述[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4(13): 43-48.
CHEN Yuming, CUI Xun. A review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theory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in values[J].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a, 2014(13): 43-48.
- [24] 曼海姆. 曼海姆精粹[M]. 徐彬,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MANHEIM K. The essence of Karl Mannheim[M]. Trans. XU Bi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5] 周晓虹. 冲突与认同: 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J]. 社会, 2008(2): 20-38.
ZHOU Xiaohong.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8(2): 20-38.
- [26] 廖小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的嬗变轨迹[J]. 甘肃社会科学, 2006(4): 215-218.
LIAO Xiaop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intergenerational valu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J].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06(4): 215-218.
- [27] 王俊秀, 高文珺, 陈满琪, 等.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基于2020年1月24日-25日的调查数据分析[J].

- 国家治理, 2020(Z1): 55-64.
- WANG Junxiu, GAO Wenjun, et al. A survey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January 24 to 25, 2020[J]. *Governance*, 2020(Z1): 55-64.
- [28] SLOVIC P. Trust, emotion, sex, politics, and science: Surveying the risk-assessment battlefield[J]. *Risk analysis*, 1999, 19(4): 689-701.
- [29] CHO J, LEE J. An integrated model of risk and risk-reducing strateg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6, 59(1): 112-120.
- [30] 李华强, 范春梅, 贾建民, 等. 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 5·12 汶川地震为例[J]. *管理世界*, 2009(6): 52-60.
- LI Huaqiang, Fan Chunmei, et al.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risks and the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measures taken during unexpected calamities — a case of May 12 Wenchuan earthquake[J]. *Management World*, 2009(6): 52-60.
- [31] 王春福. 有限理性利益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J]. *理论探讨*, 2006(3): 121-125.
- WANG Chunfu. The human nature hypothesis of bounded rational interests—A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J].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06(3): 121-125.
- [32]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 NEGROPO NTE N. Digital existence[M]. Trans. HU Yong and FAN Haiyan.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1997.
- [33] LÖFSTEDT R E, RENN O. The brent spar controversy: An example of risk communication gone wrong[J]. *Risk Analysis*, 1997, 17(2): 131-136.
- [34] FREWER L J, HOWARD C, HEDDERLEY D, et al.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risk perceptions associated with food - related hazards[J]. *Risk analysis*, 1998, 18(1): 95-102.
- [35] FISCHHOFF B, SLOVIC P, LICHTENSTEIN S, et al.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enefits[J]. *Policy sciences*, 1978, 9(2): 127-152.
- [36] 孙乐琪. 面对疫情是否需要全民戴口罩? 国家卫健委回应 [EB/OL]. (2020-01-29)[2020-02-25]. <https://news.sina.com.cn/gov/2020-01-29/doc-iihnzha5283926.shtml>.
- SUN Leqi. Does the public need to wear face masks in the face of an epidemic?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response [EB/OL]. (2020-01-29)[2020-02-25]. <https://news.sina.com.cn/gov/2020-01-29/doc-iihnzha5283926.shtml>.
- [37] 金可. 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 [EB/OL]. (2018-08-21)[2020-02-25]. https://www.cnnic.cn/hlwzfyj/hlwzxbg/hlwjtjbg/201808/t20180820_70488.htm.
- JIN Ke. The 42nd *China Internet Development Statistics Report* released [EB/OL]. (2018-08-21)[2020-02-25]. https://www.cnnic.cn/hlwzfyj/hlwzxbg/hlwjtjbg/201808/t20180820_70488.htm.
- [38] 牡丹江公安. 疫情期间聚众赌博, 牡丹江警方决不轻饶! [EB/OL]. (2020-02-03) [2020-02-2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61699.
- Mudanjiang Police. During the outbreak of gambling, the
- Mudanjiang Police will not relent! [EB/OL]. (2020-02-03) [2020-02-2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61699.
- [39] 江南微上绕. 聚众赌博不听劝告! 广信区十五人被罚 [EB/OL]. (2020-02-03) [2020-02-25]. http://jx.ifeng.com/a/20200203/8168424_0.shtml.
- JIANG Nan wei shang rao. 15 people fined for gambling in Guangxin district [EB/OL]. (2020-02-03) [2020-02-25]. http://jx.ifeng.com/a/20200203/8168424_0.shtml.
- [40] 乔志峰. 女儿举报父亲: 疫情严重, 他还聚众打牌! 是不是“大义灭亲”? [EB/OL]. (2020-02-01) [2020-02-2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305295032337470>.
- QIAO Zhifeng. Daughter reports father: Epidemic is serious, he still gathers a crowd to play cards! Is it “killing your family”? [EB/OL]. (2020-02-01) [2020-02-2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305295032337470>.
- [41] 李秋洪. 反向社会化: 青年社会化研究的新课题[J]. *青年探索*, 1991(6): 21-24.
- LI Qiu hong. Reverse socialization: A new topic of youth socialization Research[J]. *Youth Exploration*, 1991(6): 21-24.
- [42]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 FEI Xiaoto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ei Xiaotong[M]. Beijing: Qunyan Publishing House, 1999.
- [43] 梁漱溟. 中国人: 社会与人生(上、下卷)——梁漱溟文选[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 LIANG Shuming. Chinese: Society and life (Volume I and Volume II)-selected works of Liang Shuming[M].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 [44] 周裕琼. 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 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 36(2): 117-123.
- ZHOU Yuqiong. Digital generation gap and cultural feedback: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quiet revolution” in the family[J].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4, 36(2): 117-123.
- [45] 周晓虹. 文化反哺: 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 *社会学研究*, 2000(2): 51-66.
- ZHOU Xiaohong. Cultural feedback: Parent-child inheritance in a changing society[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0(2): 51-66.
- [46] WHYTE M K. China's revolu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M].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14.
- [47] GESER, HANS. Is the cell phone undermining the social order? Understanding mobile technology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2006, 19(1): 8-18.
- [48] 周晓虹. 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6): 109-120.
- ZHOU Xiaohong. Cultural feedback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utensil civiliza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6): 109-120.
- [49] 廖小平, 张长明. 价值观代际分化的多维解读[J]. *求索*, 2007(1): 134-137.
- LIAO Xiaoping, ZHANG Changming. Multi dimensional

- interpre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values[J]. Seeker, 2007(1): 134-137.
- [50] 胡玉宁.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青少年移动游戏沉迷与亲职教育[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3): 108-113.
HU Yuning. Teenagers' mobile game addiction and parenti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J]. China Youth Study, 2019(3): 108-113.
- [51] 周晓虹. 从颠覆、成长走向共生与契合——文化反哺的代际影响与社会意义[J]. 河北学刊, 2015, 35(3): 104-110.
ZHOU Xiaohong. From Subversion and growth to symbiosis and harmony —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feedback[J]. Hebei Academic Journal, 2015, 35(3): 104-110.
- [52] 周晓虹. 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2): 63-70.
ZHOU Xiaohong. Cultural feedback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media influence[J]. The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6(2): 63-70.
- [53] 方师师, 李博璠, 李秀玫. 中生代与新生代网络关注的代际差异[J]. 新闻记者, 2014(12): 16-23.
FANG Shishi, LI Bofan, LI Xiumei.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network attention between Mesozoic and Cenozoic[J].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2014(12): 16-23.
- [54] 廖小平. 全球化与价值观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整合——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背景来看[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4): 25-32.
LIAO Xiaoping. Globaliz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lu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J].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4): 25-32.
- [55] 沈毅. “仁”、“义”、“礼”的日常实践: “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J]. 开放时代, 2007(4): 88-104.
SHEN Yi.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Ren”, “Yi”, and “Li”: “Guanxi”, “Renqing” and “Mianzi” —on the realistic position of Confucian “big tradition” in daily “small tra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ial order pattern”[J]. Open Times, 2007(4): 88-104.
- [56] 李春玲. 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 ——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J]. 河北学刊, 2015, 35(3): 100-104.
LI Chunling. Is the quiet revolution near? On the antecedent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alues of the post-80s and the post-90s[J]. Hebei Academic Journal, 2015, 35(3): 100-104.
- [57] 邵二辉. 第五代人与亲代代际冲突探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3(2): 97-101.
SHAO Erhui. An analysis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fifth generation and their parents[J]. China Youth Study, 2013(2): 97-101.
- [58] 祝平良. 从主体性哲学的角度看传播活动中的传受关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4(6): 854-857.
ZHU Pingliang.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agator and the public in publicity in terms of the subjective philosophy[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 2008, 14(6): 854-857.
- [59] 朱秀凌. 手机技术反哺、亲子沟通与父母教养方式——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的分析[J]. 新闻研究, 2018(4): 108-119.
ZHU Xiuling. The mobile phone's technical feedback,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parenting style: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and use[J]. Journalism Research, 2018(4): 108-119.
- [60] 郭湛.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3): 32-38.
GUO Zhan. On the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1(3): 32-38.
- [61] 金克木. 代沟的底层——读温源宁《一知半解》[J]. 读书, 1989(6): 68-73.
JIN Kemu. The bottom layer of the generation gap—Reading Wenyuanning's *a little understood*[J]. Dushu, 1989(6): 68-73.
- [62] 刘汶蓉.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J]. 社会学研究, 2016, 31(4): 145-168.
LIU Wenro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Comparisons of two kinds of parent-relied families in Shanghai[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6, 31(4): 145-168.
- [63] 钟晓慧, 何式凝. 协商式亲密关系: 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J]. 开放时代, 2014(1): 155-175.
ZHONG Xiaohui, Sik Ying Ho. Negotiative intimacy: Expectations of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ilial piety among only-child parents[J]. Open Times, 2014(1): 155-175.
- [64] 肖索未. “严母慈祖”: 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6): 148-171.
XIAO Suwei. “Yan Mu and Ci Zu”: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ower relationship in children's upbringing[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4, 29(6): 148-171.
- [65] 郑丹丹. 个体化与一体化: 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J]. 青年研究, 2018(1): 12-22.
XIAO Suwei. “Yan Mu Ci Zu”: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s in childrearing among urban famil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4, 29(6): 148-171.
- [66] 周怡. 论“代沟”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跨越[J]. 江苏社会科学, 1995(5): 144-146.
ZHOU Yi.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leap over of “generation gap”[J].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1995(5): 144-146.
- [67] 李礼. 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的可选择机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8(4): 65-70.
LI Li. Alternative mechanisms of public safety service delivery[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 2012, 18(4): 65-70.
- [68] 张宁. 公众认知: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管理的视角[J]. 思想战线, 2006(6): 24-28.
ZHANG Ning. Public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crisis information diffusion[J]. Thinking, 2006(6): 24-28.
- [69] 韩彦超. 市场化、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J]. 中南大学学报(社

- 会科学版), 2019, 25(2): 127-135.
- HAN Yanchao. Marketization, social network and general trust[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 25(2): 127-135.
- [70] PRENSKY M, BERRY B D. Do they really think differently[J]. On the Horizon, 2001, 9(6): 1-9.
- [71] 唐江桥.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应对策略[J]. 人民论坛, 2015(21): 48-50.
- TANG Jiangqiao. Government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J]. People's Tribune, 2015(21): 48-50.
- [72] 林盾, 李建生. 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信息平台的构建[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4(1): 131-134.
- LIN Dun, LI Jianshe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public emergencies[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 14(1): 131-134.
- [73] SHEPHERD J D, SAGHAIAN S H. Risk perception and trust interaction in response to food safety events across product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agribusiness firms[J]. Journal of Food Distribution Research, 2015, 46(856-2016-58196): 92-112.
- [74] 潘泽泉, 杨金月. 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性差异与“强弱关系”不平衡性效应分析——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6): 109-116.
- PAN Zequan, YANG Jinyue. Analysis of composit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d imbalance effect on “strong-weak tie:” Based on a survey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Three Inclusions” in Hu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7, 23(6): 109-116.
- [75] 康斯坦丁, 曹兴, 姜丽萍. 代际关系与代际价值[J]. 青年研究, 1989(9): 27-32.
- CONSTANTINE, CAO Xing, JIANG Lip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generational value[J]. Youth Studies, 1989(9): 27-32.

Research on epidemic risk cognitive process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model

LU Peng, LIU F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 "Risk Society", the risk presenting suddenness and normality. In December 2019,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broke out and spread rapidly, exposing the lag and differences of risk cognit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This research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how to achieve the consensus of risk cognition and behavior through individual interaction under different risk cognitions. Through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t the family level, individual risk cognition and behavior differences mainly exist between generations. During the outbreak phase, the slow avoidance of the parents contrasts with the alert sensitivity of the offspring. During the spreading phase, the offspring begin to strengthen the risk cognition of the parents, who try to recognize and evaluate the risk. During the equilibrium phase, the two generations basically agree on the risk perception, but some of them still choose to reject it. In the process of risk cognition and consensus-building,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patterns. Among them,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from top to bottom and Internet era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from bottom to top are all one-way models, which easily lead to intergenerational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third is the two-way interaction mode based on the subjectivity, fully respecting the subjectivity status of the two generations, effectively bridg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The third model optimizes the risk communication way through trust relation, improves the risk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information decoding, and increases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information throug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t the level of micro-family, the micro-behavior support of macro-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y has been strengthened.

Key Words: epidemic situation; public health events; risk recogni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subjectivity; consultative

[编辑: 游玉佩]